

三民主義我半月刊

三民主義我半月刊

吳景恒題

第三卷 第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現代政治制度之發展.....	薩孟武
構成三民主義的諸理論.....	譚小岑
論中國外交政策.....	周子亞
教育訓導工作的三個基本概念.....	王鴻俊
對於當前物價政策應有的認識與努力.....	郭化醒
納粹主義對世界秩序的威脅(上).....	宋國樞譯
論曹操之內政.....	徐德麟
聯義社革命史略.....	趙植芝
陳少白傳.....	張鏡影
讀者通訊.....	

第五五九

現代政治制度的發展

薩孟武

由專制而民主而獨裁而權能分別之史的研究

現代國家是由封建國家發展而成的。封建國家建築於莊園經濟的基礎之上。每個莊園都能够自給自足，彼此之間沒有交換行為，因此彼此之間也沒有密切關係，各有各的方言，各有各的習慣，形成爲一個單位。經濟上的割據引起了政治上的割據，莊園的領主便是諸侯。他們在其莊園之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儼然成爲獨立的國家。君主名義上雖有統率諸侯的權，其實諸侯乃各自獨立，不相統一。所以國家的統一頗見艱難，而君主的權力亦甚薄弱。君主祇是最大的一個領主，然其權力尚不能壓倒一切領主，多數領主聯合起來，反可以壓服君主；所以君主只可稱爲諸侯中的大諸侯，不能視爲超越於諸侯之上的元首。

但是莊園經濟乃是農業經濟。農民很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須將全部勞力集中於農事，無暇顧到別的業務，所以農業發展之後必有分工，而產生了許多手工業，手工業愈進步，又促成交易的發生，於是又產生了商人。最初商人是以行商的方法，往來交易，以後遂於一定日期，集合於一定場所。商人既於一定日期一定場所，集合爲大規模的交易，由是市場因之發生，人口愈增加，貿易愈隆盛，市場又進化為都市。

商人與農民不同，不願固踞於一地之內，他們要發售其商品，必須開闢廣大的市場，他們常往來於邊疆異域，將商品銷路，其結果使歐洲發生了一個發見時代。一四八六年地亞士（Columbus）發見好望角，一四九二年科倫布發見美洲，一四九八年伽馬（Vasco da Gama）發見印度新航路，其動機即在於此。新世界既已發見，商業資本愈發發達，一方由於國內貿易，而要求國家的統一，他方由於世界貿易，而要求國家的獨立，於是中世的封建國家就發展爲近代的統一國家。

其理由是很簡單的，商業每集中於最適宜的地方，即集中於交易的通路。外國商品先運到這個地方，而後再散布於全國，國內商業也集中於這個地方，而後再輸出於外國。由於這種關係，遂使全國以該地爲中心，成爲一個經濟的有體。商品生產愈發達，商品交換愈頻繁，各地歸屬於這個地方也愈益明顯。

國內人民由於經濟上的需要，遂常常運到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愈發達，又變爲全國的大都會，不但可以支配全國的經濟生活，並且可以集中全國的精神生活。於是該地的方言遂成爲商人及學者的用語，漸漸影響各地土語，而使國語因之成立。

國家的行政隨着經濟的集中，逐漸集中起來。中央政府由於時勢的要求，亦以該地爲政府所在地，這樣一來，這個地方遂變成全國的首都，不但經濟上可以支配全國，而且政治上也可以支配全國。現代國家有統一的首都，集中的權力，惟一的首都，就是這樣成立起來的。

國內實現河使組織發達的國家變爲中央集權的國家。世界貿易期可使人們發見國家觀念，要求國家獨立。何以故呢？中世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在單一國家之內雖然彼此對峙，不能統一，而其對於外國，只要外國沒有擾亂莊園的和平，他們向來是不關心的。反之大商巨賈則不能不顧慮自己的國家在外有了怎樣的作用。商業利潤的產生乃在於販賣而賣，買者與賣者的勢力關係如何，對於利潤仍有很大的影響，他們最希望者乃是不出一錢，由商品所存者，減低了商品；不然，亦希望能夠用最低的價格，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用最高的價格，發售自己生產的商品。這個行為是國家權後發達的。

不但此也，買者與賣者之間，或賣者與買者之間，亦常常發生戰爭，在外國市場則變為國民的鬥爭，在巴爾幹半島，英國商人與德國商人的利害衝突，乃是一種國民的鬥爭，德國對於巴爾幹半島，若能增加勢力，則其國商人一定可以得到通商的特權。德國愈強大，自己利潤愈增加，於是他們就產生了國家觀念，而要求國家的獨立。

這個發展過程對於君主當然有利。何以故呢？君主的利益較得乃與商人的利益一致，君主爲了自己的利益，對內須統一政權，對外須擴張勢力，而商人也爲了開拓國內市場起見，又爲了保護對外貿易起見，希望有一位君主，集中一切權力，對內壓倒封建經濟諸條，而維持行政的統一，對外充軍備，而發揚國家的權威，所以當君主與封建領主鬥爭之際，商人無不援助國王，這樣，集中一切政權與軍權於一身的專制政治遂見成立。

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的貿易政策，造成國家的統一與獨立，而發生君主專制政治。商業愈發展，工業愈進步，隨着就有工業革命，而使資產階級積聚了巨大的財富，成爲經濟上的最高階級。最初他們爲了開拓國內外的市場，不能不援助君主，到了統一民族國家成立之後，他們又進步，反對君權的曾做請求束縛賤迫，出來要求政治上權利，藉以保障自己營業的安全及活動的自由。經過種種鬥爭之後，他們在政治上亦成爲最高階級，但是近代資本家乃與古代的貴族不同，他們並不是有閒階級，奴主到制奴，領主到制農奴，他們可以坐享被制階級的產物，反之資本家雖然制勞動大眾，然却不是有閒的制削者，現代產業界是很複雜的，職工要雇用多少，工資要發給多少，貨物要生產多少，價格要規定多少，販路要如何開拓，公司要如何擴充，技術要如何改良，原料要如何供給，這些一切都要以奪取資本家的有閒時間，而自由競爭的現象更可以逼使資本家時刻須首於產業的經營，資本家對於產業若不注意，產業一定失敗，而自己亦歸於滅亡。資產階級既忙於於產業，自然沒有時間，兼顧到政治。同時在政治方面，亦受了經濟的技術革命的影響，而變更各種行政的技術，并發覺各種行政的分工。研究財政的人未必知道作戰如何計劃，研究軍事的人未必知道別人如何談判，研究法律的人未必知道公債如何整理，而在經濟軍事法律之中，又有無數小分工。在這種情形之下資產階級自然沒有能力兼顧到政治。

三 民主主義半月刊

資本家一方面因爲忙於產業，沒有時間兼顧政治，同時又因爲政治發生了分化，自己沒有能力參與政治，遂把政權委託於專門人才——官僚，使他們處理政治上的事務。但是一切政權若均委託於官僚是最危險不過的。資本家在經濟方面已經積了許多經驗，自然知道把全權交給別人，每可釀成「喧賓奪主」的現象，所以他們於官僚組織之外，更要求三個制度：一是代議制度，即設置議會，以作代表民意的機關，使其監督政府的行政。二是立憲制度，即制定一高憲法，把人民的基本權利尤其是財產權和自由權的不可侵犯，規定於憲法之中，此後議會立法不得與憲法條文相抵觸，而政府行政又須局限於法律的範圍內。三是分權制度，把國家權力分做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分屬三個機關，使他們互相制衡，以預防專制政治的發生。總之，他們採取政權的目的不在於仰慕國家的保護，而在於制限國家的干涉，所以他們一方面擴張個人自由到最大限度，他方面縮小國家權力到最小限度，俾他們在社會上有種種活動的自由，以發展他們的營業。

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不同，專制政治只要社會環境有利於君主，可以依靠君主個人的努力，而民主政治則須依靠政黨的活動；但是一國人民能夠組織強有力的政黨，又須該國人民有了共同一致的目標，以作他們團結的基礎。在民主政治剛發生之際，歐洲各國人民是有同一目標的，當時階級差別尚不明顯，不問工人與農民，不問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也不問大資本家或小資本家，他們受了專制政治的壓迫，均欲制限君主的權力，乃於「自由主義」的目標之下，團結爲一個政黨，用合羣之力，以與君主相鬥爭。鬥爭得到勝利，又整歸議會之內，利用立法權尤其是財政同意權，督壓政府的行政，這個政黨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動力，由此可知民主政治能夠成立，須有兩個前提，其一全國人民有共同一致目標，而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其二這個政黨能代表強有力的階級，利用財政同意權，監督政府的行政。

民主政治成立之初，固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其實，這不過是民主政治的形式，不是民主政治的本質。資本主義發展，勞動階級也覺悟，最後就發生了勞工運動。勞工運動的目的在於改進經濟生活，而其手段則爲奪取政權。經過種種鬥爭之後，各國無不廢除限制選舉，而施行普通選舉。普通選舉既已施行，全國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均有政權，於是民主政治遂建

完成之域。

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的貿易，引起了國內的工業的進步，而國內工業的進步，又造成了新的國際形勢，即所謂帝國主義便是，我們要知道資本主義何以會變成帝國主義，必須考察國際政策。國際政策是各國政府用海關作武器來限制外國商品的輸入，而保護本國產業的發展的。因此之故，在關稅政策之下，產業發展的程度乃視國貨的銷場大小而定。關稅政策愈大，市場愈大，從而產業可以充分發展，關稅政策愈小，市場也愈小，從而產業就沒有發展的機會。所以各國為着發展自己的產業起見，常常努力擴張關稅領域；但是關稅領域是和國家領土相一致的，因此，各國就不能不設法侵略別國的領土。這是帝國主義發生的原因。

在帝國主義時代，政治制度會發生如何變化呢？民主政治是二元主義的政治，把社會與國家分開，議會代表社會，政府代表國家，議會是經濟的團體，國家是政治的團體，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經濟方面需要自由，人們不希望國家保護，只要求國家不干涉，於是認為擴張個人自由到最大限度，不能不縮小國家權力到最小限度，而為了縮小國家權力，乃使代表社會的議會出來代表國家的政府，需要行政機構，效率就低。但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形勢又變化了，經濟從帝國因受經濟先進國商品的壓迫，必須採用保護政策，以國家的權力，促進產業發展，而後始能保全自己的生存。經濟上這問題因為經濟後進國，已經開始產業革命的過程，自己商品不能暢銷，所以以前此種商品市場等各種者現在商品則須以國貨為先鋒，利用國家的權力，幫助市場的開拓。總而言之，這個時代不問經濟後進國或經濟先進國，要發展其本國的產業，均須依靠國家的援助。這樣，國家權力當然不能同從前一樣，縮小到最小限度，而須擴張到最大限度了。何況國際關係日益險惡，政治問題日益複雜，天天須制定無數的法律，天天決定無數的政策。民主政治既經權力分散而不集中，又使行政緩慢而無效，當然不能應付時勢的要求。唯一的方法只存把一切權力集中於一個機關使其自由決定政策，從種種困難之中，殺出一條血路，以維持國家的安全。這樣，民主政治又變為專制政治。

民主政治的轉變為專制政治，當然是受了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民主政

治本身也有其改進的必然性；何以言之，民主政治必須國內有四大要素，出

來運用政權，而大政能夠成立，又須國內多數人民有共同一致的目的，但是資本主義發展，階級差別愈趨愈明，而階級差別又不能成為兩個對立的階級。一方面有資產階級，他們自由競爭，資本漸漸集中，到了最後，少數金融資本家竟能支配一切產業界，而使資本家之中發生了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對立。他方有勞動階級，他們人數天天增加，而勞動者的數目減少，勞動者的雇用，大多數失去職業，變為勞動預備軍，而使勞動者之中，發生了勞動黨與資產黨的對立。在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又有無數中間階級，他們因為沒有共同的利害關係，所以沒有共同的階級意識，每每分裂為小集團，互相排擠。階級的分裂可以破壞國民的統一。階級意識發生可以破壞國民意志的統一，其結果遂影響於政治之重，而獲政黨之數日益加多。任何政黨在議會內既不能得到過半數的議席，而每個政黨又各有其的主張，各有各的政綱，不能聯合起來，結成議會。每次發生重大問題之際，議會意見參差，不能隨時地決定政策，以應付時局的需要。議會失去立法之力，因之立法權遂由議會移屬於政府。政府在時局緊急之際，可以發布緊急命令，用以代替議會制定的法律，比方德國在威瑪憲法時代，議會常常授權政府，許其發布代替法律的命令，如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的法律（RGBl. 374）一九二〇年八月三日的法律（RGBl. 1403），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的法律（RGBl. 139），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的法律（RGBl. 943），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的法律（RGBl. 1176）等是。到一九二〇年以後，各種問題日益複雜，於是政府就不待議會的授權，而直接依據憲法第四十八條，發布緊急命令，以代替法律。並將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二年（國社黨尚未被敵以前）的緊急命令與法律的數目列表如次。

一九三〇年 五 九五
 一九二一年 四二 三五
 一九二二年 五九 三五
 立法權既由議會歸屬於政府，人民司空見慣，竟便承認之為正當的手段，代議機關失去主權，分權制度發生破裂，於是民主政治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更進一步觀之，民主政治其多數公決的政治。就是政治問題由大眾討論，依多數人的意見，決定其可或施行，這個時候多數與少數是運動的，不宜固守的，換句話說，參加討論的人，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依公正的見解，有時屬於這一派，有時屬於另一派，有時屬於這一個集團，有時屬於那一個集團，贊成或反對主張，而後政治問題提交大眾審議，才有意義。倘令多數與少數自始自終已確定，那末，何必討論，也何必表決。但是議會之內，多數與少數，如果不能確定，則議會自無常因之不能組織強有力的政黨。反之，多數與少數如已確定，則一個政黨若能得到過半數的議席，該黨所贊成或反對之政策，該黨所反對者必不決，這樣一來，討論與表決又失去其固有之意義，原來國民對於政治問題，不但今日贊成甲黨的主張，明日贊成乙黨的主張，並且在同一時間之內，又往往屬於A項問題，贊成甲黨的主張，關於B項問題，贊成乙黨的主張。倘令議會之內，有了一個絕對多數黨，則它可以不顧人民的意向，自由施行自己認為妥當的政策，這和一個獨裁，試問有何區別？英國自一八九〇年以後，自由黨開裂，勞動黨開裂，只保保守黨尚保持其原有的勢力，暴政選舉，因為政府一個強有力的政黨與其競爭，於是保守黨在議會內佔優勢。因此之故，張伯倫的外交政策雖然失敗，而繼起者又是保守黨，即吉爾內閣，這和十九世紀自由黨與保守黨交替政權的情形顯然不同。一個政黨關於外交政策雖然失敗，繼之而成立者還是同一政黨之內閣，這之英國政黨政治的歷史是沒有這個先例的。所以英國今日名譽上雖是民主，事實上無異於保守黨的獨裁。

三民主義半月刊

而人民乃往往無「權」。所以 國父又說：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近幾十年來，歐美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畢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它的政府確是成了萬能政府。（民權主義第五講）民主麼？人民有權而政府無能。獨裁麼？政府有能而人民無權。一般人都是以爲其一，必捨其他，能够把兩者結合起來，而成為一種特殊制度的，則爲權能分別。國父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怕是得了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但是所怕的所怕都只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爲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够把政府變成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在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權與能要怎樣分別呢？權就是政權，能就是治權。政權完全屬於人民，治權完全屬於政府，人民有充分的政權，當然可以監督政府的失策與違法，政府有完全的治權，當然能够爲所欲爲，即如 國父所說：「政府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現在成爲問題的，治權屬於政府是取分權的形式，抑是取專權的形式？國父在五種憲法之中，固然有五種分立之語。但是權力的分立與政府的若乾乃是不能並存的。權力愈分立，政府愈無能。權力愈集中，政府愈有能，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現在講民治的國家，無不採用分權制度，分權的結果，政府一舉一動，常受牽制，所以 國父才說：「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反之，不講民治的國家，比方德國畢士麥當權的時代，一切權力均集中於政府，政府想做什麼，便可以做什麼，所以 國父又說：「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都是很有能的」。由此可以證明，要使政府萬能，權力不宜分立，要使權力分立，政府便不能萬能。然則 國父在五種憲法之中所謂權力分立，又如何解釋呢？我們以爲

五

國父的思想是不斷進化的，惟能不斷的進化，故能成其偉大，五權憲法（書名）經發表於建國七年，三民主義（書名）發表於民國十三年，權力分立主義於五權憲法（書名）之中，萬能政府主張於三民主義（書名）之中，依據後注勝於前法的公例，我們只有依據三民主義（書名），何況我們研究一位偉人的思想，必須把握他的中心觀念，不宜引其片言隻語，以作自己的護符，不盡，國父的民族主義可以解釋為排滿，國父的民生主義可以解釋為南北朝階級的均田了。國父說明權能分別之時，曾告訴我們：

「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因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民權主義第五講）

「只要他們是存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請了專家來，一舉一動都要來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這是很慢。（民權主義第五講）

「試問這都主張是分權強，抑是集權？「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便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在權力分立的國家，機關的組織乃基於制衡的原理，那裏會存在這樣強有力的政府，如果有了這樣強有力的政府，國父何至說：「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

「現在試再引建國大綱，以證明我們的見解深合於國父遺教。建國大綱第十九條說：

「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全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法，其順序如次：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直隸院長皆由總統任免，又由總統督率，那末五種治權可以說是集中於總統，總統就是政府的領袖，而與國民大會相對立。五院院長皆由總統任免，又由總統督率，所以五院乃是政府的機關，五種乃是政府的權，而與國民大會之為人民的機關，四種之為人民的權者，完全不同，所以國父又說：

「我們在政權一方面，主張四權，在治權一方面，主張五權，這四種和五種各有各的範圍，各有各的作用，要分清楚楚不可磨滅。（民權主義第六講）

「固然建國大綱第十九條所規定的制度乃是「憲法未頒布以前的制度，但是這種制度既實行於「憲政開始時期」，一方面用此「以試行五權之治」，同時憲法又須依照其試行的成績而制定（建國大綱二十二條），那末憲法所規定的制度，當然不能與此完全相反，如果完全相反，那便是由集權跳入分權，何得謂為試行？更何得以其試行的成績，以作制定憲法的張本？

「五種治權集中於政府，政府固然成為萬能，但是政府成為萬能之後，「要怎樣才聽人民的話」，「而受人民的控制呢？控制政府機關是國民大會，控制政府的權是四種政權，政權本來屬於人民，惟因吾國人口太多，領土太廣，所以只能委託於民選的國民大會行使，國民大會是代議機關，就其組織說與各國議會沒有什麼區別。國父是反對代議制度的，他說：「如何而後可舉主權在民之實，代議制度於事實於學理皆不足以當此」，（中華民國建國之基礎）而對於國會則認為與人民不可混為一談，他說：「國會與人民實非同物」（中國革命史）國父反對代議制度，而國民大會乃和議會一樣，也是代議機關，那末國民大會當然須和議會有些不同之點，我們參照國父遺教，知道國民大會和議會不同之點，應如次述：

國民大會是代表國民的，代表關係可以分做兩種，一是法定代表，二是委任代表，在法定代表，代表關係由法律規定而發生，就是被代表者非由其本人的意思，乃由於特殊的理由，依照法律規定，把處理一定事項的權委任於代表者，代表關係既非由被代表者的意思，所以被代表者對於代表者，不能參與與訓令，代表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斷，自由行使代表權，同時被代表者也沒有撤銷代表者的權利，在委任代表，代表關係由於雙方的授受，就是被代表者由其本人的意思，把處理一定事項的權委任於代表者，代表關係既由於被代表者的意思，所以被代表者對於代表者，可以給予種種訓令，代表者必須服從被代表者的訓令，行使代表權，假令代表者不服從被代表者的訓令，被代表者隨時有撤銷代表者資格之權。人民與其代議機關的關係，最初是委任代表，例如封建時代的三級會議，據當時習慣，凡為代表者皆服從國

舉行的命令，執行職權，閉會之時，又須報告一切情形於選舉人。近代民主國則採用法定代表之制，即由民選出議員之後，不但不能干涉議員的行動，並且是議會任期未滿以前，人民又不得罷免議員。但是到了最近，各國憲法關於代議機關的性質，又趨向於委任代表制，而其辦法則有兩種。其一各選舉區的公民得投票選免各該區的議員，即罷免權只能適用於該區個人，不能適用於議會全體，聯邦的新憲法，便是採用這種制度。其二全國公民得投票解散議會，即罷免權僅能適用於議會全體，不能適用於議員個人，普魯士一九一八年憲法就是採用這個制度。這兩種制度都是將議會的性質，由法定代表改為委任代表。國民大會也宜採用委任代表制，各區公民可以罷免各該區的國民代表，使國民大會能夠代表真正的民意。人民既有罷免國民代表的權，所以民權主義雖然主張直接民權，而又不許人民創制法律與復決法律。因為人民對於國民代表的罷免權，乃與人民的直接立法（創制與復決）成爲相紐的物，直接立法若已施行，人民自然能制定自己需要的法律，因之國民代表的罷免沒有必要。反之，國民代表若得選舉，國民大會自然能夠代表民意，因之，直接立法又無必要。瑞士承認人民有創制權與復決權，所以不承認人民有罷免議會議員的權，蘇聯承認人民有罷免議會議員的權，所以不承認人民有創制權及復決權（新憲法第四十九條第四款所規定的復決權，不是用以發揚民意，而是用以解決聯邦與各邦的衝突或政府議會的衝突）這是研究民權主義者必須了解之點。

與議會制度可把政府弄成無能。議會制度何以會把政府弄成無能？因為議會可用立法權牽制政府的行政，所以要求使政府成爲無能政府，就須限制國民大會的立法權，即國民大會對於任何法案，不啻有表決權，只宜有修正權。換句話說，立法權應屬於政府的機關，國民大會不得干涉之。但是國民大會若以政府制定的法律不合於民意，可以復決；國民大會認爲人民需要的法律，政府不肯制定，可以創制，這種制度名義上雖是事後修正，事實上却和事前預防有同一的效果。因爲在國民大會，雖是事後復決，而在政府，必將恐怕國民大會復決，不敢制定人民反對的法律。在國民大會，雖是事後創制，而在政府，必將恐怕國民大會創制，而即制定人民需要的法律。刑法的效用不在於每年殺人多少，而俾於使人恐怕刑法制裁，而不敢犯法，復決權與

創制權的效用也是一樣。要是事事復決，事事創制，那就無異於殺人盈野，方見得法官的高明了。

國民大會固然只能事後矯正，但是國民大會天天若有矯正之權，便使國民大會天天可以牽制政府。政府天天受了牽制，當然無法成爲無能，所以使政府成爲無能，國民大會便不宜每年常用開會。倘若每年常用開會，國民大會將和各國議會沒有區別。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所公布的憲法草案，規定國民大會每三年開會一次，這種合於權能分別的原理的。何以說呢？一方面使政府於三年中，不受任何牽制，以按照既決的方針，施行其一貫的政策，同時又使國民大會每屆三年出來審查一次，審查的結果，若認政府是好政府，則其繼續存在，若認定政府是惡政府，則發動罷免權，驅其下台。這樣，國民大會所理想的「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政治組織方能成功。不然，不是人民有權而政府無能，便是政府有能而人民無權。

由此可知「權能分別」一方與民主不同，政府不是時時刻刻受了代議機關的牽制，他方又與獨裁不同，政府不是永久不受民意的制裁，有兩者的優點，而無兩者的缺點，國父稱爲全世界政治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孰敢否認？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 徵集團史史料啓事

查本團應國民革命之需要而誕生，負抗賊建國之使命，五載以還，團務日益發展，各地團員或效命疆場，或馳驅敵後，此項悲壯、勇之史料，與日俱增，茲爲表揚忠烈策勵來茲起見，已開始從事團史史料之編纂，除由中央暨各級團部徵集外，深望見聞未周，難免遺漏，用特登報徵求，敬希各地團員同志，將有關本團團務活動之記載、照片以及忠勇死難團員之史實傳略暨其他珍貴資料，儘量賜寄，屆時當分別奉酬，並希于本年底以前郵交重慶兩浮支路中央團部編審室爲荷。

（三）權能分別論與優劣平等論

（三）權能分別論與優劣平等論

孫文主論對於民權主義所持的中心理論為優劣平等論與權能分別論。

就宇宙生物界的自然形像和性而來觀察，我們很少能看見絕對同一的物象。一顆樹上的十百千萬片葉子，百千個葉子，其組織大體相同，而在形體、重量、表面上都很容易找到其個體間的差別。至於樹與樹間，禽獸與禽獸間，各個不相同的形像與性，無論何種與異種，都是複雜的。惟有人類的物件，在一個形像中造出來，才有同一的形像。

人與人間的差別，正所謂：「人心之不同如面」。無論其相、性、智、慧，都與少數的同一。其性體之參差，較之各個大馬從此性體之差別尤為顯露。大到大開在操縱好政上，為真萬開在行遠行遠操縱方面的優劣個性，是我們所共知的。人與人間個性的差別，在政治方面都感到很多的不同。

這種情形雖然是一種絕對的事實，可是歐洲的民主政治思想的起源却出於「人生而平等」與「天賦人權」的理論。他們沒有知道在封建制度下的君主專制與貴族政治所發生的毛利乃由於君主與貴族之世襲。一個天生愚劣的小孩，祇是因為他的父親是君王或公侯，他也可以無條件地居於為萬民處理國家事務的地位，如是不免發生殘酷的政治行為，弄得民不聊生。

在中國，典型的封建，世襲政治早經取消，所以歷代劣劣的君主往往祇有自民間選舉或將相輔政或遺囑繼承的政治。在歐美，自十八世紀革命運動以後，世襲政治相繼取消，君主專制漸不存在，最後祇剩下之形。但在天賦人權論之下，人人都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生而平等的機會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公開着，祇須各個人自己去努力追求就不難得到。這就成爲了民主主義的思想，以為人生一切都是自的，惟有權能才會比較成功者都是自己奮鬥的結果。

這種理論產生了過去百餘年來的歐美的民主政治。那些獎勵者爭相顯赫權能之能工，顯赫者因人口集中的工商業中城市的土地，從而加強別人

王親非親神明

的勞作，縮減其生活條件的享受。於是因新式生工具發明而增多的財富，完全歸於少數富人手裏。這少數富人為了確保其既得財富并繼續把持

到制，這少數富人，乃用金錢運動選舉，使代表民主政治的議會完全成爲代表富人利益的機關。富有的平民，本特無參加政治工作的機會，即生活狀況亦極艱難。直至帝國主義時代，這種現象才得從窮小民族身上剝削下來的錢財，實行社會政策，以分潤給這些窮苦民衆，緩和了貧富對立的情形。然而政治大權仍大半操在富人手裏。

孫文主義的優劣平等論與權能分別論批評了這種思想。人并不是有在以來就是平等的。人生下來在性體上有着實質才智平庸愚劣的分別。這實質才智者如能以服務爲目的爲人民服務，他們即可取得應有的政治地位。這種科學的認識引用到民權主義上來，最爲切合。聖賢才智在其爲人民服務中受到人民的愛戴，被選拔來擔當政治工作，以果進擴大貢獻其能力於社會國家。對於那些佔最大多數的平庸人民以及少數的愚劣者，則須讓他們有選舉人事與否決定制度之權。在這一意義上，全國民都是平等的。是之謂真平等。而那些才智之士當其未能當選爲衆服務時，還應該給他們一個考試的機會，取得服務的地位，以表達其才能。這也是真平等。

又當一個有能力的人被選舉出來爲衆人服務，就該給他充份的機會發揮其能力。在一個組織健全的國家中，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這五種治權應分立起來，由政府負責，使之成爲一個高能的政府。而人民則不僅擁有選舉權，同時還有罷免權，不備擁有創制權，而且擁有複決權；是之謂直接民權。這四種直接民權應成爲政治變革或政治變革的政治設備。以達於全民政治。如是實際的人乃得有多有爲人民服務的機會，而個人應有的權能，也不久即可被人民獲免的。這就是權能分別論的簡單要義。

（四）階級利益協同論與一次革命論

這種理論都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批判。對於馬克思主義，以為金都應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而在實際革命後，第一步先由資產階級起來推翻封建政治，然後再有無產階級專政其推翻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并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這種理論用階級利益來觀察，就說中國現在正進行着資產階級專政

革命的階級，將來還要來一次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事實上已經證明沒有這一回事。

孫文主義的原理，以為中國的革命是可以「舉其功於一役」的。中國的整個革命任務可以由國民黨完全祖負起來。國民黨既不代表資產階級，也非代表無產階級，而由各種職業者中的先知先覺與後知後覺者組織而成。在進行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民黨代表著全中華民族的利益；在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行政工作中，國民黨代表著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這兩種主要的任務顯出國民黨並無所謂「階級性」之存在。

在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苦鬥的當中，對於民族資本的利益顯應加以維護。因其既可以加強抗戰的力量又可以幫助進行邊陲，以促進工業化之完成。倘使政權能穩定掌握在國民黨手中，民族資本之擴大，自然形成資產階級採掘政權的危險。德國狄森之說不免於出此，美國「大王」們之不能影響羅斯福的「新政」，已可看出資產階級對政治至今已趨於消滅。有組織的工人羣衆與國民黨工作之配合，節制資本的政策定可順利進行。在這項工作運行到了相當的時機，直接稅的累進率應增加到可能的高度。那些於民生利益有直接關係的產業應及時沒收，社會福利事業由社會保險費的大量徵收，以支付其費用，務使羸弱孤獨老幼疾病者有所救養。這些原則皆經 國父在民生主義中有詳明的指示。倘能如此，則國內自無階級對立的病態發生，在帝國主義勢力完全驅除以後，即可和平的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國父惟恐帝國主義與軍閥推翻以後，因中國人民對於行使四權知識之缺乏，以及一般文化水準之低落，所以在建國大綱中對出舉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為有步驟的提提高民權。這一個時期的革命任務之進行，在中國雖將感到其大的困難，但必能勉力克服而使之完成。政治的設施配合着經濟的改革，中國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自不難「舉其功於一役」了。而在歷史法則上，階級之對立，從足以驅國家於危亡。中國的漢唐宋明之亡國莫不由於此。羅馬為野蠻民族日耳曼所征服又何真不然。凡君盜和平的國家率由全國人民協力合作，貧富貴賤之際不顯，人人安居樂業，乃得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文化進步使然。社會之進化實賴有此。階級階級之對立而起的革命運動，多易流於暴民政治，倘無偉大政治家為

之中流砥柱，急流狂瀾，鮮有不移歸失敗者。故階級之對立在於歷史過程中為一種病態。權力的政治固可對症下藥從根本上去除此病源，然實易致對立之階級之混除，而非應加以煽動。

吾人因感胃而體溫增高，為一種病態。西醫用冰袋頭頂使之強迫降低，誠不若中醫以調五臟陽發汗除之為愈，實同一理。於此，吾人亦可看出東西哲學思想之差異。

(五) 社會價值論

價值論為政治經濟理論的根本。勞動價值論與供求價值論皆因各有所偏，致造成歐洲經濟學史上無止無休的爭論。如是，乃有社會價值論之產生。近年歐美持社會價值論者雖不無其人，即以勞動價值論為全部理論體系中心的馬克思亦不能否認有社會價值之存在。但或則仍屬支離破碎不完，或則僅見及其片面，而認係實業革命後一種初變的形態。惟有在三民主義中，社會價值論始得發其全面的意義。

迄今歐美治經濟學者，對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劃分雖頗重視，然對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關係，從無明確的說明。馬克思以為具體勞動，產生使用價值；抽象勞動乃產生交換價值，在表面上似言之成理，且能自圓其勞動價值的理論。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是否有其直接關係之問題仍未解答。供求價值論對於本問題之解答，在表面上雖較馬克思主義為明確，但不澈底。

蓋人類之所資以為生者乃各物之使用價值，初未計其交換價值也。五谷果實鳥獸所以為食，皮毛所以為衣，泥土竹木五金所以為器，知其有益於人生者，即取之以供使用。當人口繁殖，容易獲取的自然物，偶感缺乏，不足以供食用時，初則加強勞作，如行遠以覓菜蔬，追逐獸類與之搏鬥，或入水尋魚，期以補充。繼因文化進步，生活方式較繁，需用亦較多，於是劃地畜牧耕種之遊牧農業生活，與「以有易無」之分工社會乃從而實現。一佃專事深遠山林獵獸的人，自無暇鍛冶刀劍弓箭或種植五穀，而皮毛獸肉，又為鍛工農夫所需以為衣食。對於遺留獵人，一張獸皮究能換取多少刀箭

論中國外交政策

周子亞

在討論本題以前，我們先要明白什麼是外交政策，所謂外交政策，直截了當的說，是一個國家辦理國際交涉的一種學問。亦可以說，是辦理國際交涉的一種技術。總而言之，它是處理一國涉外事務與國際關係之「科學」及「技術」之兩種工具的綜合。要辦理一國外交或者確立一國對外策略，不但需要科學的基礎，而且還要有精詳的運用。外交的範圍因此包含甚廣；不過就大體而論，外交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份是外交政策，一部份是外交行政，前者是處理對外關係之原理原則，好比人之神經中樞，後者是外交策略的運用，有如人的四肢手足，如果不把神經中樞弄得健全，那麼外交行政一定不會很靈活，因此要談論外交，外交政策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外交政策實際上，有兩個內容：一是外交方針。這個方針是一國對外行動的準則，是一國依其地理、歷史、經濟、政治、民族、宗教諸種環境所確定的經世不移的原則；第二個內容是外交策略，這個策略的內容可以隨時訂定的。譬如今日我國最高國策，亦即是我們外交上的根本方針，是求取民族獨立，取得國際上的平等，這個政策是經久不變的，但是在這個政策之下，我們的策略是可以隨時隨地訂定的。再舉一個例來說，大家都知道歐洲有一個「均勢原則」，這個「均勢原則」是英國對歐洲所採的一個基本外交方針。均勢原則的意思是不許歐陸只有一個強國的存在，用「均勢會英倫三島」不過在這個原則之下，時常因時間的不同，空間的差異，而表現着表面上似乎矛盾的策略。就是它有時幫忙法國抑制德國，有時却又幫忙德國抑制法國。德國強大的時候採取前一種策略，法國轉盛的時候採取後一種策略。這種「二鳥於一籠」的策略，在英國的立場上說來，與它的基本對歐政策，並不衝突；因為助法抑德或者助德抑法，只是達到它根本目的不同的手段罷了。從上面這個例子看來，外交方針好比一面羅盤，外交政策好比一支南針。

南針指向東南西北者，無非是受道而羅盤的暗中操縱指示。外交政策實是處處都受外交方針的牽制。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形成，它的地理的，歷史的，經濟的，政治的，種族的，宗教的諸種因素，這些因素都很重要，不可把任何一因素忽視。現在簡單把它說明一下：

(一) 地理環境的影響。英國學者霍奇斯在他所著「國際關係的骨量」一書裏面說：「今日地理之事實就是明日歷史之事實」。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句話的正確性。譬如帝俄時代，它地理上的缺點是缺乏海口。這個缺乏海口的地理事實就成爲後來彼得大帝侵略土耳其企圖打通至黑海之路的歷史事實。兩次俄土戰爭以及俄國、法國、英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的鬥爭，也就是這個地理事實所造成。又譬如英國這個國家外交的形成，以及它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就是由於英倫海峽。英倫海峽對於英國的重要，比較不成文憲法之對英國的重要，有過而無不及。因有英倫海峽，英國對外基本政策才確立起來。它的政策就是維持歐陸均勢。因此英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可以說大半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赫勒在他所著「英倫海峽」一書裏面說的「一千九百年帝國之形成由於英倫海峽之保證所致」。由此可見地理環境影響外交的一般。

(二) 經濟影響外交。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士在其「原富論」裏面曾經說過近代一切事可以拿經濟的原理原則去解決它。我們試看近代帝國主義運動，殖民地運動都有經濟關係做背景；因此，經濟影響外交是一件很明顯的事情。

(三) 政治影響外交。外交政策是一國對外之表現；因此外交政策受到國家政治理想影響是沒有問題的。舉一個很淺的例子講，近世有所謂民主集團與軸心集團。民主集團是民主的和平的，因此它的外交是民主和平的。

的；軸心國家是不和平的，是集權的；因此它的外交是不和平的，是集權的；由此可以證明政治理想是如何影響外交。

(四) 文化宗教影響外交。有人說世界上若沒有種族的區別，也許世界上沒有戰爭。這句話很淺顯，可是這句話亦很有道理。試看歐洲歷史，假如沒有大斯拉夫主義，沒有大日耳曼主義，沒有盎格魯撒克遜主義，亦許第一次世界戰爭，第二次世界戰爭不會發生。再看宗教與外交關係，從中世紀由於宗教而發生國際糾紛，以說不勝枚舉。不過因為近代宗教力量衰微，所以宗教影響外交很少。再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亦很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外交，我想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在這里不必贅述。

各國外交行政部是受上述各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決定亦不能例外。中國最高的政治理想與政治制度是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與政治制度。中國的民族主義有二個目的：一是對內求自己民族的獨立；一是求國際和平的實現。這兩個對外的理想就形成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其次就經濟方面說，現在的中國外交政策以及將來的外交政策都受經濟政策的支配。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工業沒有發達，要想從農業經濟走到工業經濟，從不近代化的國家走到近代化的國家，在這種經濟背景之下，我們的對外政策就需要國際互助合作。我們需要國際的力量用和平的方式來建立我們國家成爲一個近代的國家。這就是中國外交政策。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文化。這四五千年的文化使中國受到歷史傳統精神的支配。就希望世界和平不希望世界有戰爭。以王道精神和平處世，是中國人對外的基本態度。早在春秋時代，孟子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很透澈。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義假力者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假如採取霸權，雖大無用。如果採取王道，雖小，而在國際上自己可以發生一種力量。這種歷史傳統遺留下來的精神，到了我們 國父手裏，就承先哲後，把它更加發揚光大起來，創造了三民主義，建立了中國對外的基本政策。

以上是說我們中國外交政策的大概情形，現在再來看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別國的外交政策有什麼不同。外國的外交政策很複雜，種種族仇恨是各國外交政策很明顯的一種現象。中國的外交政策卻沒有這種複雜。在裏面，中國對外第一在求本身的獨立自主，其次求國際和平的實現。換句話說，中

國絕對不至於侵略別國，也絕對不至於反和平。這種不侵略別國，不反對和平的態度就表示我們兩國絕沒有種族鬥爭的意義，反過來看看在歐洲就有所謂大斯拉夫主義，大日耳曼主義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等等，這是中國外交政策與別國外交政策不同之處。

由於地理的、歷史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種種因素所形成的中國外交政策，它的最大表現就是三民主義當中的民族主義。再由民族主義演繹出來，就是抗戰建國的綱領五條的外交方針。現在我簡單的把這五條綱領說明一下作爲本題的結論。

第一條：本國自主的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民族，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

第二條：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的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

第三條：聯合世界上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

第四條：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

第五條：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之一切偽政治組織及其對內外之行爲。

在這五條綱領之中，第一二條和第三條後半條可以說是在中國外交的一般原則與目的，第三條前半條和第四五條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外交策略。前者是經；後者是緯。二者相成，就成爲中國整個的外交政策。何以言之？筆者簡單的加以說明如次：

任何政策，必定有一個目的。中國的外交政策的目的，在抗戰綱領前兩條已經說得很明白，簡單的說，第一，對內求自立，對外求生存，不希望國際間有糾紛有戰爭，希望大家和平相處。第二，本國自主的精神以達到這個目的。中國要取得民族的獨立，國際的不平等，根據我們的綱領並不是依賴外面的勢力，而是自強自立獨立奮鬥。因此，本國自主的精神取得中國獨立與對外的共存，是中國外交的第一個目的。第二個目的，剛才我說過，中國並不僅僅以自強自立以爲滿足，還要從事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這一條的規定，已將我們的意思表達無遺。

中國外交政策第二項其大原則在民國二十六年國民政府自成立後即已宣佈。聲明書裏面說：「中國今日當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遭受日本之侵略，國際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所破壞。此種侵略最大目的在維持其與日本之同盟，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維護其領土主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的尊嚴。」

誰都知道外交政策的運用，小國古來皆一國而處不成功的道理，就是所謂遠交近攻。遠交與近攻的運用，中國在國際上雖然只有一國，但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在外交上，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在外交上，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

第一、要注意外交政策的運用。在軍事上所謂毒定目標集中對擊的原則，外交上亦是如此。多邊外交運用自如，在集中一個目標，攻擊一個敵人。抗戰綱領第四條規定要聯合世界上一切友邦，這與第三條亦有關係。世界上凡是我們的國家無一不是我們的友邦，但是我們認清一點，凡是我們的友邦，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我們不能不與敵人鬥爭。

由此可知，中國外交政策，應循從理論方面與事實方面，我相繼世界上的方面與國際的方面，那一個得上的資格。這一個問題，務必是在中國，第一、要有責任。世界上的愛和平的國家，向這一個目標邁進的，務必是在中國，第一、要有責任。世界上的愛和平的國家，向這一個目標邁進的，務必是在中國，第一、要有責任。

讀 者 通 訊

五清先生鈞鑒：

我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我入黨到現在已有四年，在丹徒縣黨部工作已將近四年了，自從去年起，訂閱一先生主編的三民主義半月刊，到現在已將有一年的歷史了。在短時間內，使我對三民主義的認識與了解，增加了許多，可惜我是一個初中畢業生，因為畢業後遇著重重環境的障礙，而沒有辦法升學——對刊中有些理論，還不大全曉，不過我相信，假使我日夜不斷地進修，和經常得蒙一先生的教誨，我想將有一天，是會達到那個希望的。

今天公餘之暇，不知什麼緣故，使我特別高興，使我的腦子也特別大，一個對主義的理論沒有了解的初中畢業的主義信徒，敢於不揣庸昧的寫了一篇「抗戰建國與三民主義」的稿件，文字是顯得那麼可憐，不消說，理論是完全沒有，詞句是糟得不堪。不過，我想這是第一次的嘗試，如果一先生認為有登載的餘地，我在這遙遠的小城裏敬請不怕麻煩的割愛，如果是不行的話，亦請一先生不吝賜教，俾我進修對的主義信徒有能前進的階梯和前進的可能吧！

肅此敬請

四川丹徒後樓德新學友六月十七日
附「抗戰建國與三民主義」一篇。

德新學友：爾及大書均收讀，可以見到你好好學學的心情，是如何的殷切！你的文章，只是常識的認識，寫了就算，不必急於發表。希望多讀書，不讀的地方多問人，久而久之，水到渠成，真足可以對到古人所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了！祝健！

天清七月二十一日

教育訓導工作的三個基本觀念

王鴻俊

教育的效能，在於陶冶健全的人格，使之合乎集體生存（民生）之條件，而健全人格之陶冶，在於培養健全之德性。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

教育的效能，在於陶冶健全的人格，使之合乎集體生存（民生）之條件，而健全人格之陶冶，在於培養健全之德性。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

教育的效能，在於陶冶健全的人格，使之合乎集體生存（民生）之條件，而健全人格之陶冶，在於培養健全之德性。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德性者，即三民主義教育即此其真。

三民主義半月刊

（一）為人性本善論：主張被教育者的個性，應任其自然發展，教育者是助其個性發展的手續，教育者祇是助其個性發展的助手，若加以干涉，則違反教育的本意，阻礙各人天賦的發展。（二）為人性本惡論：主張教育者應以改造，教育是改變人類獸性的工程師。（三）為人性善惡兼具論：主張人性有善有惡，可善可惡，以為教育應發展被教育者的創造衝動，抑止其占有衝動，以達於至善。

總理的人性論是從進化的歷程中說明人類精神動物性時期，進至靈性時期；由獸性時期，進至人性時期，再由人性時期，發展而為神性時期。現在人類天性已進化到什麼程度？他說：「人類本從物種進化而來，其入於第三期的進化，為時尚淺，即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見孫文學說）人性是否尚有進化的可能？進化的程度是否高於以前？也斷定其可觀：「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同於互助原則，以進人類進化之目的矣。……近代文明日以加進，最後之百年，已歸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歸於以往之百年，如此退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見孫文學說）人性能進化到如何地步呢？依進化原理推測起來，人是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而進化而至於神靈，故欲造就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神性就是人類進化的起點。（見國民要以人格教育）怎樣才能消滅獸性，發生神性呢？就是：「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運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要造就神性修教的方法，慢慢去做。……必帶全國的人，都要有體育智育教育的人格才好。」（見國民要以人格教育）

一七

總括 總理對人性的指示，(一)人性善惡論，只是機械的觀察，不會變化定準。(二)人性進化的可能性甚大，且可以經過真善美的神性。(三)現代人性尚未進化到最高度，即尚未止於至善，正待吾人助其邁進。(四)促進人性的重要工具，是教育，各人都應有「教不倦學不厭」的精神，如轉教者之所為，使文明能有進步。

總括對於 總理人性的見解，復加以補充說：「人本是一個既存的動物，但因為人類進化，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利他的衝動，這一種利他的向上的衝動，存之於心便是德，施之於物便是善，故德實自覺而善實及人。」總之，人性既是進化的，向上的，利他的，教育就要發展人性，促進並加強其進化的程度。

二、知與行的問題 在訓育上知與行的關係如何呢？一般人往往認為學生最容易發生知而不行的現象，作導師最感頭痛的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其實知和行的問題，總理有知難行易的學說，總括有力行哲學，兩種學說，實是 總理與 總裁偉大人格的自我寫照，艱苦卓絕的革命經驗的自述，又可作青年人格陶冶的榜樣。我們能充分瞭解而應用之於訓育，收效必速。

國人迷於「知之匪艱，行之為難」一說，在為學做人上受審頗深，不但沒有深測的求知工夫，認一知半解為滿足，且亦不肯身體力行，習於畏難苟安。所以 總理為推行革命主張計，特「先作學說，以去此心理之大敵，而喚醒人思想於迷津」。以作革命道德行為的基礎。

知難行易學說「實為空虛間之真理，施之於學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然也。」其主要的意義有二：一為不知亦能行；二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意思，是說明行易。不必等知而後行，蓋忠信之德，基於天性，人人有之，多有不知而行者，如乍見孺子入井而往救之，見牛不忍而鼻之以羊，是仁德之發於本性，不勉而中，未知而行，故其易。 總理引孟子盡心章：「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來予以證明。

能知必能行的意思是說明知難，有了透澈的真知必能見之於實行。例如 朱子所謂：「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友不

得不信。」既如有人雖口說事親應孝，對友應信，而行為上不能實踐孝信之德，乃由於對孝信之理講得不明，見得不透之故。

總括本艱苦革命的經驗，對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褒揚而光大之，則為「行的哲學」亦稱「力行哲學」，認為要由行以求知，不行不能知，而主張力行。力行就是致良知。他說：「我們本來人人曉得革命是好的，但在事實上却又不能照着革命的道理去做。那就是行動與意志不能一致，那就是不能致良知。」他又說：「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有良知要能致，那是行，即所謂實踐良知。」所以 總裁特別提出「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之說來教人。他說：「我們大家若知道知難行易的哲學，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學說，這個知道的知便是良知，我們能夠努力實行這個知難行易的學說，這就是致知難行易的良知。」簡切點說，致知難行易的良知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謂致知難行易的良知就是指一般的行政力行而言，勿畏難，勿忽易。亦即勉為其難，力行其易之意。第二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乃指實踐革命的主義而言。所謂所信仰的主義為吾人的良知，就是努力實行主義。實現主義的意思，以革命的主義為內容，以致良知為方法。以三民主義為良知的內容，以致良知為實行三民主義的方法。(參見革命哲學的重要)

其次，總裁知行與動的分別，解釋得很清楚，他說：「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所以於本體言，行較之於動更自然，且平易；就其結果與價值來說，動有善惡，而行則無善惡。……或者可以說「動是低級的，而行才是高級的。」(見行的道理) 總裁這種說法，正合於 總理所謂人性和獸性的分別，我們實可以說行是人之本性，動則或多或少均帶有獸性。

總括知難行易學說和力行哲學。對知行的看法為(一)行與動有別。(二)不知亦能行。(三)由行以求知，不行不能知。(四)能知必能行。這實在是訓育上最切合的哲學基礎。訓育工作，應該發展人之本性的行，而抑制人之獸性的動。要發展人之本性的行，又可以利用上述的辦法。如習慣的養成，在小學階段頗為重要，可以多利用不知亦能行原則，訓練兒童在練習中不知不覺的養成優良習慣。同時亦由行中以漸漸發覺其知，及年齡稍長，中

學階段的青年，雖然有許多習慣的養成，仍可使不知而行，但要注重由行以求知，不行不能知的原則。一方面使之力行，一方面使之由行以求知。以進即行即知，即知即行之目的。到了大學階段，知與行已受了相當的訓練，更應特別注意力行的精神，由力行以求知，以知知指導力行。經過上述的階段和方法，自然易於養成實行三民主義的健全青年。

三、個人與社會問題。訓育的意義，既在於陶冶健全的品格，使之合乎集體生存（民生）之條件。換言之，也就是發展個人以適應社會理想。我們的理想是三民主義的新社會，所以訓育即應以三民主義的社會哲學為依據，確立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及人生理想。

民生史觀是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也就是三民主義的社會哲學。我們由總理的民生史觀認識了社會進化的原理及人生的意義。

總理以為社會之所以進化是由於人類求生存之故，他說：「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又說：「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步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蓋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見民生主義）依照總理的這意思，求生為人類社會之動力，一切演進均自此出發。

總理既以為人類社會進化之主要動力在於求生，而主張求生最合理最適當最自然之方式，不是鬥爭，而是互助。所以他說：「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今日尚未能盡守此原則者，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一切物種進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而為，莫之致而致，向互助之原則而求達到人類進化之目的矣。」（見孫文學說）至於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見孫文學說）在「天下為公」之大社會中，一切民族政治經濟問題，均得合理解決，而為真善美之社會。

總括 總理民生哲學的社會觀有四：（一）民生為社會進化之原動力，（二）人類促進社會進化，所採用的方式為互助，（三）社會進化最高理想為「天下為公」之大同社會，（四）大同社會之人類都是互助博愛的。

人類社會進化之原理如此，則人生之意義與理想不難確定。

在「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中，民生問題得到完美的解決。人人得盡其生，一切行為不是為己，而是利他的，仁愛的，所以說「利他是革命的本質，仁愛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仁愛的極則，無過於「天下為公」。」（見 總裁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仁者愛人，仁是愛之體，而愛是仁之用。總理說：「三民主義即仁之所由表現」，又說「救國之道在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仁依 總理的解釋，就是博愛，所以他也曾說：「三民主義即博愛主義」又說：「博愛為公愛而非私愛」即「天下有亂者，田已飢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如宗教家之救世，慈善家之救人，愛國志士之救國，皆是博愛（軍人精神教育）

所以博愛即是個己的精神人格與全人類的精神人格完全融合而毫無個人我畛域之私見的意思。

總裁繼承 總理的此種思想而發揮之，對於人生的意義說：「生活的目的，在利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體處的生命。」并主張「宇宙萬物都屬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所以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要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益人類的生活。」（見 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一週年告青年書）欲達此目的，總裁特別注重力行，說道：「我們今日要完成主義，要盡人類一分子的責任，求人生最完滿的境界，我們的行為所為，皆要本乎「至誠」，如此，我所貢獻的勞力，所貢獻的智識，乃能創造，能進取，能建設，能有意義。乃能把「天下為公」的民生哲學確定了思想，認清了方向，就我們的本性，發揮我們的良知良能，決心力行，坦白勇敢，一往無前，充其行之極致，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是甘之如飴。無所畏懼。古人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力行博愛，這種力行，就是革命。」（見 總裁：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總裁所指示我們的人生，是創造的人生觀，革命的人生觀。

教育訓練工作，雖然包括千頭萬緒，但對於學生應有的基本觀念，不外此三端。幾十年來我們的新教育，始終在徬徨中找不到出路。也就為的這三個基本觀念，始終沒有正確的答案，如今我們根據 國父的遺教，總裁的訓示，已經燃起了這一個明燈，以後的教育訓練工作，自然可以踏上一個嶄新的階段。

真收入固定，生活日苦，行政效率低落，影響抗戰工作的進展。其他各異僑
求內應，水漲船高，各得其平，只恐惡德低劣動而提高軍政人員的待遇
，或由政府掌握物資，供應軍政人員的消費，即爲已耳，不必進行嚴
格的管領工作，以予加緊。這種觀點，不是把物價問題看作支那軍
，價值與自由市場的關係，首先，物價問題，不應去成爲軍政人員
的生活清苦，影響抗戰工作的進行，實則分肥問題，應予考慮。普通上地人
員外，一般收取金銀及勞工階級，也是物價高漲下的最大犧牲者。隨我國
依賴收取金銀爲生者比數不多，但是社會階級資本家，金銀漲價將
無固定存儲的資金，投放在長期性生產事業，影響於生產事業。反過來，亦
多市場物資，在在波瀾物價。其一般勞工階級，除自由市場勞工外，亦
多依賴固定薪資收入，雖然大多有其他方面的補償，然這不及物價增高之過
，影響工作效率亦大。到社會其他各階層，凡因契約關係固定其收入者，亦
莫不深受物價高漲之苦。社會各階層的各種物價不漲而高漲而不漲，以趨
於無契約行爲，社會秩序與一切正常經濟活動將何以維持？若就農工商界而
言，一般農工生產則轉弱，危險性較大，其實際收入不及經營商業者的
優厚，即收入較多者，也無不多少有投機囤積的行爲，談不上所謂有計劃的
長期生產與經濟建設。其因生產困難或不願經營生產者，多轉趨於商業方面
的投機，幾年來社會游資日趨累積膨大，歸入於物資缺乏的市場之中，獨
作樂，演成物價狂漲的現象，已於前車之鑒，即就商界各階層而言，也因市場
物資缺乏，各業商彼此又非力量均衡，完全競爭自由，市場隨時可以發生
斷續的行爲，多財者買及利用權勢者，無不獲利千百倍，貧者則益多。
一般勢力較弱者，其實際收入並不多，至正當經營商業者，得有虧累，甚至
無立足的餘地，豈得爲平？以上種種種種，顯明調劑，至若社會風氣敗壞
，重義輕利觀念沒落，種種糾紛不斷滋生，不幸事件隨之蔓延，社會呈現分
化停滯的危機，各種正當事業陷於停滯狀態之中，又無不爲物價高漲，社會
分崩離析最嚴重的惡果。豈僅可以解決軍政人員的生活問題？如果
隨物價的高漲，提高現時軍政人員的待遇，在目前財政困難情形之下
，勢必假手於大資發行，不僅發行方面有若干困難，即待遇提高若干程度
，亦難通不上物價增高之過。何況市場則應購買力益見減退，物價必漲，將

三民主義 半月刊

加速通貨膨脹的危險。或有謂政府可採用徵用徵購實物的方法，掌握
物資，供應軍政人員的消費。但是各方面需用浩繁，種類亦多，年來政府
亦經運用此種方式把糧食，惟究屬極少部分，且爲國有國民大之公平的流弊
不得已的權宜。若普遍運用於日用品方面，不免有商賈因民大之公平的流弊
，將引起社會極不安。即使把糧食到大批實物，計劃分配，又須備有各種
龐大設備，從徵購運銷各方面嚴密管理，方能減少層層中間消費物資的
浪費。此種流弊甚多，工作亦繁，又僅能解決很少數人的若干程度的分配問
題。不若集中力量，遏制一般物價高漲，替得民實物資的產運銷趨於常軌
，恢復其正常供求關係，以解決社會整個分配生產問題，銷除社會財富形
分配不均的危機，與健全財政金融基礎之爲宜。

或有謂物價須管制，但是我國許多實施管制的條件不齊，困難特多，並
且在現時行政效率低落與執行管制人員素質不齊的情況下，實施管制，恐
無有他的成效，而反有其弊。如管實物以來，各地物價仍多繼續上漲，且
有壟斷之勢，可爲證明。這種壟斷最爲流行，也多屬實情。雖然在當前艱
難與種種機構條件多欠缺情況下，管制物價，收效不易，但是不能以
爲物價僅在上漲，遂認爲實施管制無效。即在歐美戰時清稅健全，與各種管
制條件比較完善的國家，實施物價管制，也不能說完全制止物價不漲與暴市
發生。如在英國當時困難環境，更不能說阻止物價不動。在當前情況下，
實施管制的使命，是遏制各地物價狂漲的惡果，消去它的不合理的漲勢，藉
平地方的緩和的增加，並不可避免的。在本年各地開始實施管價時，確有許
多地方的此種成效，使得各種物價得到相當的穩定，使以多數地方準備備
局，與種種缺憾並即時補救，遂致各地物價仍多有壟斷之勢。即在過去幾
年中政府都實施各種物價管制，也不能說都無有成效，凡計劃比較周密，
籌備比較健全，方法比較完善，力量比較充實者，它所管制的物價，也就比
較的穩定。擬以各種物價相互影響，實施地區不廣關係，每致事倍功半，僅
是少對於各種物價尚有一種壓力的效果，是不可不採辦的。否則在幾年來
市場擴大游資猖獗情況下，各種物價狂漲高漲的可怕程度，將非目前所
想像得到的。本年實施管價推廣至各省市重要地區，各省市收到的效果，也
是隨各地努力程度不同而有差異，管制愈周密機構健全者，所收的效果

愈大，所發生的流弊也就愈多。是則當前物價不是不可以管制，若干實施管制的客觀條件，也不是不可以逐漸辦到，只看有無實施管制的決心，與切實可行的完備辦法，去澈底的力行。自然當前實施管制的成果，不能認為完全滿意，有若干方面須要進一步縝密審劃，積極推進，有若干地方須要切謀改進，加強實施，都容待後面討論。此地所要強調說明的，就是當此物價上漲的趨勢，愈久愈急，愈漲愈急，愈加增高的時候，不能不管制，它能否迅速而堅制的物價猛漲之風趨於相當的穩定，就要看上述各方面努力的程度如何而定。同時管價政策的內容，也不僅限於以行政力量強制物價的上漲，所以掌握物資，節制消費，取締囤積，嚴密組織各種工作，均應包括在內，以建立鞏固完整的管制物價政策。其他增進生產，便利運輸，調整稅法，管制金融，吸收游資等工作，也要切實配合推進，加以實施，庶能保持管價政策澈底實施，以鞏固戰時經濟之本。

還有謂實施管價，頭緒紛繁，必須耗費許多財力人力，全面推行，方能有效，而當前國際情勢已在急形好轉，最後勝利歸於我國，物價問題自然隨抗戰勝利之際而消滅，現時對於物價管制，可不必多所舉措。這自然是最樂觀的看法。不過回顧前國際國內的情勢，瞻念抗戰建國的前途，殊有許多不得不令人悚然深省之處。就全般情形來看，我們的艱苦局勢，似還有相當時期的延長。即到抗戰勝利之後，物價是否可以馬上安定下去，又殊屬疑問。試就上次歐戰後各國情形來看，德俄兩國物價歷年幾十年的狂亂狀況，造成悲慘的結局，雖或有意願的驅使，我們可以置置不論。即就英法兩國情形觀之，英國在一九一八年停戰時，批發物價比戰前一九一三年上漲兩倍左右，法國三倍多。此後繼續上漲，至一九二〇年四月時達至最高點，英國物價漲到三倍多，法國將近六倍。嗣後逐漸下落，至一九二四年始趨安定，國計民生痛苦，良久始蘇。雖然我國將來情況不必與他們相似，密因抗戰局勢好轉，人心振奮時，各地物價暫時有若干的跌落。但是我們戰後是創痍未目，廣大的農村，急待恢復，各地工業交通，諸待整理建設。同時國外物資，又以戰後各地變遷，恢復整理需時，短期間亦不能希冀有多量的輸入。各方面需用的物資，仍然是至感缺少。另方面種種復員建設工作，需用浩繁，財政費用，似尚須繼續有若干時期的膨脹。同時各種通貨（包括紙幣券在內）均

須積極整理，需時亦多。此種情況下，物價問題似仍為戰後若干時期中的嚴重問題，恐有過之無不及。各地物價必須擴大範圍繼續管制，才能於抗戰勝利之後，得穩固經濟情況的保障，連建國必成之功。同時我們要建立戰後民生主義的經濟基礎，也需要嚴格管制物價。預防社會財富的畸形不均，所以在目前物價問題進入嚴重階段的時候，我們需要集中若干人力財力，克服若干的困難，建立今後較長時期管制物價的基礎，嚴密管制物價，挽救當前的危機，安定戰後的經濟，以進行抗戰建國的大計，豈可不急為之圖？以上是在當前實施管價中，比較有力的幾種反對論調，需要我們去深切檢討，以堅定管制物價的信心。其他若干方面片斷的見解，以及目私自利者流，管價不便於己，唱言消滅於業者，自無討論的必要了。

三 加強管價實施幾種重要工作

根據上面的分析，今後的問題，自然是如何加強限政的實施，有效的管制物價。其間方面頗多，自非短篇所能詳加討論，且中央及地方當局已在逐步調整推進之中。不過就管見所及，似有幾種重要工作需要積極進行，無妨提出，容不無可供參擇之處。

第一、本年開始推行管價之際，係選擇各省市重要市場實施管價，自為初步實施時適應現狀，執簡馭繁的緊要措置。嗣中央續擬推行補充聯繫辦法，以謀逐步推進調整，惟迄今各省限價，似仍多集中於少數重要市區。雖有實施限價地區較廣者，亦以各區管價缺少適當的聯繫調整，必然的結果，使得重要市場的物資供應與來源阻滯，及物品產銷價格未能適當聯繫，相互波動，漲落爭高，差不多是各地實施管價未能收效的於顯著原因。誠然各省地區廣闊，重要市場場為數頗多，如果由少數重要市場推廣至次要市場及一般地區實施管價時，此種聯繫調整工作，自更為繁重。不過在戰時交通運輸大多不便情況下，有執簡馭繁的聯繫調整方式。因為各重要市場管價實施後，其物資之運送，多以鄰近的交通較便的市場為原，同時各重要市場的消費貨品，大多由鄰近區域供給，或與鄰近的交通較便次要市場，彼此供需關係密切，物價相互波動影響較大，多自然形成一種經濟關係比較密切的地區。故為便於調整各該地區貨品產銷與聯繫各該限價工作起見，各省似可

分別就各地區重要市場爲中心，依當地交通運輸與貨品產銷狀況，制定其附近交通較便次要市場或重要產銷地區，爲所屬的管價地區，即以該地區中心市場統制附近的主要市場或重要產銷地區，配合中心市場管價，並適該區內一般地區的物價管制。隨轄市等次要市場，自宜制定附近經濟關係比較密切的縣市爲所屬的管價地區，配合管價。這自然只能就大致情況說，如果各省有些管價地區不容易劃分，亦可就原有的行政管區，分別進行督導，調整並聯繫區內各縣市管價工作。其各省交通閉塞不便地帶，或特殊區域，自可暫不分區管價。至各管價地區配合管價的方式，首宜在管價物品方面謀得一致。各管價地區實施管價的物品，除應遵守中央規定之八類重要物品外，並宜因地制宜，分別選擇次要物品若干種，逐漸推廣，實施管價，以逐漸消除各種物品間相互波動的影響。但是各區內中心市場管價物品的主要項目，其他各次要市場除因特殊情形外，均宜配合實施管價，並詳列管價價格的適當聯繫。其調整管價步驟亦應一致。由是各管價地區內的限價工作分別得到適當的聯繫調整以後，進謀各管價地區間的聯繫調整，也比較容易進行。例如各聯繫管價地區間必須互通有關物品產銷價格情形，其各種物品有配合實施管價的必要者，亦可相互協作聯繫，而後由省分別督導聯繫調整，及在中央統籌聯繫之下，庶易使各地物價保持相當的平衡，以至全面物價趨于適當的穩定。似爲當前推進全面管價的首要工作。

第二、推進全面管價，固須使各地物價保持適當的差度，讓各地物品能夠自然流通。同時爲擴大後方各種重要物資，或生產不足比較缺少的必要物資，能夠得到比較合理的支配使用，使地境間能夠有無相濟，時間上能夠的盈濟虛，也要運用政治經濟力量，控制物資的產運銷路，疏暢其流通，調劑其供應，以支持各地管價徹底實施。是掌握物資工作的重大使命。自然各種物資產銷供應情況不同，重要性亦有差異，其實施管制調劑方式與所需要管制的程度亦各有差別。本文暫不討論。此地所要討論者，是幾項重要調整聯繫工作。首先在幾年來政府管制各種重要物資產銷當中，若干物資，中央有專管機關統籌管制者，亦有各省分別實施管制調劑者，各不一講，辦法紛歧，重複衝突，自所不免。同時各省各別實施管制調劑物資，又多有封鎖阻礙物資出口情事，影響管制實施至巨。近來中央力謀聯繫各省，舉行會

議，但重在打破此種現象。其間似有下列幾種工作需要切實進行：(一)中央各專管機關統籌管制重要物資，自然有許多地方是力量不及，不得不交由各省或各地方實施管制調劑，但是應當各有一種聯繫調整辦法去實施，避免重複衝突的現象發生。(二)各種物資管制調劑的實施辦法，須要從全面着眼，在扼要控制產銷情況之下，去謀實效其流。過去許多局部枝節實施管制調劑辦法，都有重新加以檢討或予廢止或予修正的必要。(三)各省實施管制調劑重要物資者，宜力謀物資機構單一化，或由各該管管制物價機關統籌調劑各地區的供應，配合各地管價的實施。(四)各省間經常調劑運銷大量重要物資者，宜在中央督導之下，分別商議運銷調劑辦法實施。其次，調節各地物資，固須從全面着眼。而控制物資供應，維持各種物價均衡，重在各市場。如果各市場管制各種物價與控制供應工作，各別進行，毫無聯繫。不僅此種波起，隨時引起各種物價間的波動，亦且力量分散，事倍功半。這也是過去各地管價未收宏效的重大原因。所以各地管制物價在可能範圍內，應力謀單一化。凡當地有中央專管物資機關或省物資機關者，應與當地管制物價機關，切取聯繫，分工合作，共謀管價工作的推進。復次，掌握物資工作，在後方各地，除爲供應軍政重要必需者外，應以督導民營，控制其產運銷路爲原則，避免與民爭利的弊弊。但是在戰區各地，因爲後方實施管價，不免有些物品使商人搶運却步，甚至使物資外流。所以除了嚴厲運用政治力量外，宜多着重于經濟力量的運用。在接近戰區要地，或實施管制邊境上的重要據點，似宜分別交由中央及各省物資機關設置機構，各依條例辦法，對於一般實施管制的必要物資，不惜高價，集中收購，依後方管價配銷手續少地區。或協助商運物資內銷，充裕物資來源，以支持後方各地管價的實施。

• 以上對於當前掌握物資工作的調整，似亦爲推進全面管價的急要工作。

第三、由上所述，實施管價與掌握物資工作有不可分離性。在當前推進全面管制物價情況之下，必須以實施管價爲經，以掌握物資爲緯，集中力量，密切配合實施，方能收到調整聯繫控制物價事半功倍的功效。而收到此種效果，又必須對於現時各級管制機構，有相當的聯繫調整，才能靈活運用。依照前述分區配合的管價方式，如隨轄市統制附近縣市市場配合管價，省轄市及重要縣市場統制附近一般縣市配合管制，均以前略不同，調整聯繫，即有

運用不靈捉襟見肘之勢。也需要對於各級管制機構及在指導方面，有相當的調整，才能有靈運用。基於此種需要，擬定實施情形，下列幾點，似亦當可得到：(一)在一般情況之下，各省市縣管物機構的設置，須由省市縣政府主持，會同當地中央或省管物機構的分支機構及其他有關機關，擬定管制機構，並動配合當地各種物價管制工作的推進，並充實其設備，辦理一般管制業務。各機關在集中力配合工作之方式下執行各種管制物價業務，庶幾齊一並進，以收穩定市場物價之功效。(二)各省市縣管物機構，應在各級不同情況之下，可有三種方式：第一種，純由省市縣政府所在地之兩縣兩市，由中央或省管物機構直接指揮，配合市區限價；第二種，有縣市政府其他各區中心縣市，由省管物機構直接指揮，或派員主持組織管物機構；第三種，各區縣市管物工作，由省管物機構於該區設置管物機構指揮之。(三)各省管物機構，其主要職責中各方面之計畫組成之，但須避免彼此重複運用不靈之弊，並直接指揮管物機構，須能綜合各方面政治經濟力量，統籌全省管物機構之實施，一方面能直接指導各省市管物工作，另一方面能指導中央各專管物機構之管物業務，配合全面管物工作的推進。由是管物機構系統確立，上下相輔，緊密聯繫，集中力量，分工合作，方能靈活運用，推進各種管物之有效實施，控制變化多端全面的物價。

第四、各級管制機構，不僅在形式上需要靈活運用，在實質上也要相當充實，或切實的調整。例如中央管物機構，僅要看籌備全面物價管制，及推進各級管物工作的責任，並且要有負起這項重任的權力與健全充實的組織。又如各省市縣管物機構，需要充實健全，才能有效執行各種管物工作。本國各省市縣管物機構，至為薄弱，許多工作到了這一層，多感不易有效執行。何況管制物價的繁重工作，自然更難勝任愉快。因為經費人員的不敷，不免因循敷衍，徒具形式，使得規定的管價打格難行，即或規定的管價比較合理，也因管制力量不充，難期執行。更加以一般行政效率的低落，不能有效推進各種管物工作，並不是各地管價失敗的主要原因，所以目前補救之道，除了上面所述組織各省市縣管物機構集中力量外，還

要充實健全基層機構的內部組織，確實能夠信任執行管制工作。總之，管是要使之確實實行。自然充實健全各地機構，須要有相當多的經費與人員，不過為了穩定一般物價，解決影響社會的物價問題提高一般行政效率，而健全財政基礎，需要耗費些經費，來補救目前增大的缺額。如果誠不怠之務，節省不必要的支出，多方籌措，先從交通較便的市縣切款補充，似亦較易。各地物價趨于穩定後，各方面因物價問題所耗費的經費，自可大大的減少。同時現時各種困難的人才頗多，如果選擇特殊管物機構，有的並不需要人員之多，但求少而精，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再對於執行管制工作，才能有效推進，各種管制法令，才能切實奉行，各地管物價格，自可在相當嚴密管制情況之下奉行遵守，自然各種流弊發生。以上似為當前加強管物機構必要的條件，也可以說是加強管物政策的骨幹。管物機構立以後，其他安謀各地管價的合理調整，兼收管物機構的實施，銀行與管物機構與運反管價，健全同業組織管物物產，調節供給，也都容易辦到，亦多管制技術上的技術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否則根本起來，不惟不易得到若干的效果，又難勉有治絲益絲的危險發生。

四 結語

總之當前物價問題的嚴重性，雖仍在增長之中，但是穩定物價的措施，是已經有了相當的經驗。我們自不可因為它有若干的缺點，發生許多疑難的企圖，且日普通物價問題無辦法，坐讓物價飛揚狂風之風奔騰上去，而須堅定信念，誠已有其基礎，急謀各種管物工作的措施，如加強實施，設法減輕物價在普通物價之火爐。實際上這種管物工作，是不可克服的困難，只要在物價波動之下，向下最大的決心，去協力合作，分頭並進，才不是沒有有效管物的方式，還須要從全面根本方面著眼，從各方面着手，同時還要一般人的消除心理上若干的障礙，各站在自己位置上，去努力協助，去澈底力行，它的效果，必可以顯現地。今後大家應注意物價穩定情況之研究，各專事業的發展，共同抗戰大計的推進。庶幾社會各方面所發生的種種困難問題，可以漸漸消除而解。至關於如何增加各地物產的供給，與減少市場通貨數量的各方面工作，自然也要大家切實協助，加強推進。庶幾當前物價問題，確實穩固地穩定經濟基礎，以應建國後建設的基礎。

納粹主義對世界秩序的威脅 (上)

朱國樞譯

納粹主義，在日內瓦「國際思想」雜誌一九四〇年所發表，關於納粹主義在國際法上的批評。本稿係譯述納粹民族國家對世界秩序的威脅，茲有討論到詳細的法律問題，還是普通的政治論。譯者因其與過去在本刊發表的譯文，同一系統，特再翻譯於後。

(一) 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

人類社會的組織，擴大到了國家和民族的時候，這個組織內的份子大家覺得民族的利益，超越個人的，家族的，職業的，乃至宗教的利益，於是共同努力，永保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和光榮。所以民族主義，在同一國家的各份子方面，產生一個「利益等差」。在心理上，形成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信仰，至於在本國族和外國族的人中，劃定一道鴻溝，在心理上，造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他主義。這兩句話，足够代表獨族的民族仇外的原因。我們所以仇視外國人的緣故，並非外國人一定對我們不好，若我們內心知覺因為是外國人，他們的心理，必然和我們不同，因此和外國人合作這件事，萬萬做不到，既然如此，大家就作如想見：「不是友，即敵」，「固不必受到滅亡而後說。

真正信得民族主義者，一方面肯犧牲個人的，家族的，職業的，乃至宗教的利益，以維護和增加國家的利益。他方面，又特別愛護本國族的利益，保護其他國族。我們從歷史上觀察，發覺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有連帶共同的關係，因民族主義在哲學上的基礎，也就是自由觀念。不過提倡民族主義的人，要求國族團體的自由，不是要求個人的自由，甚至為保全國族的自由起見，要求個人犧牲自由。這種種國族利益的表現，在各方面都很明顯，凡是宗國族的特殊點，大家無不努力求其保存和發展，這種作用，無非使

個人感覺自己已和別個國族的人，根本不同，一方面，變成自尊自敬的心理；他方面，構起排外的因素，因為有了和別個國族不同的特點，必將要求其他國族加以尊重，如果對方不加尊重，或肆意摧殘，那末，雙方的惡感，勢必日益加重，成為未來戰爭的起因。

這種本國人和外國人同異的惡感，完全以各方的特殊點，所謂民族性者為根據。因民族性的形成，可說和遺民族的歷史，不能分開，而且宗教的遺傳與感應，總為自然力的作用，人力顯難加以阻礙。據基督人教一種平等者，頗不乏人。耶教創人類平等之說，以博愛為實現平等主義的主力，又創立心靈不死的說，宣佈無論富貴貧賤，其後其靈魂都到上帝面前，受最後的審判，受賞受罰，只以各人在世所作功過為標準，絕不視其身分地位為重。所以人類的差別，僅是容貌上有點不同，其他一律平等。除宗教徒以外，又有人道主義者，也都宣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種特要主義，他們以理智控制情感，使人人了解四海之內，凡是國頂方圓者，都是兄弟，何必互種仇殺呢？不過歐洲的人道主義者，一方面，以共同研究的拉丁文，為傳播福音的工具，他方面，又從研究羅馬和希臘的文藝學術，探知各個民族，均有尊長，如羅馬的法律，希臘的藝術，兩者都算諸手上乘，但著以羅馬人為希臘的導師，以希臘人行羅馬的法律，必沒有這種圓滿的成就，垂為歷史上最高的典範。因此，人道主義者，主張對各個國族固有「和特殊的文化，應該互相尊重，他們並且要求各個國族的文化，平行發展，不受阻礙。他們說，人類文化上的差別，正如草木易地而異其光彰，又如女子以不同的衣飾，取悅於人，凡此總足以表示生活上的富麗，何有強迫呢？以故各個民族，應該自由發揮其固有的文化，不應受到任何的桎梏。

再從個人的立場說起，我們各個人都以自由發展其本能，為迫切的要求，到了這種要求成為大家一致的動向的時候，大家就覺得將這個自由發展本

能的要求，使同土地、同信仰、同語言文字、同習慣風俗的、同族團體，同種得到滿足，豈非合乎邏輯的結論嗎？從前的專制國王不許人民自由發展本國，同時，他們征服異族之後，常迫使異族人民，同化於本國，並且採用種種方法消滅異族的語言、文字、宗教、風俗，希望更輕易地馴服他們。自由主義者，既以領導全國，推倒專制政體，爲實現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他們當然也反對本國人對外國人施行虐待，當然亦同情外國人得到自由。所以這理自由主義者，一方面提倡個人自由，他方面，亦提倡國族自由。最初的國族主義者，曾經努力宣傳，要求恢復本國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因此，他仍和自由主義者，實是志同道合的。

以後，個人自由主義者和國族自由主義者，逐漸背道而馳。國家主義者反對個人自由，例如捷克的國家主義者，反對國民同化於日耳曼族，德國的國族主義者反對法國大革命解放運動，以及拿破崙的專制政治，他們竭力抵抗「人權宣言」，防止外國勢力的侵入。自從民主政治發展以後，國家主義更形鞏固。兩種主義彼此間的裂痕，日益深刻。民主政治的專制，和君主制的專制，初無分別，所不同的，君主是一個人的統治，民主政治是大多數人的統治罷了。在大多數人的意見超越一切的情勢之下，少數人的意見，當然認爲無足輕重，因此，少數派縱有正當理由，亦認爲無一足處。事實上，或許因爲前受有各種慘痛的經驗，多數派對於少數派，常採取寬容政策，並不真正虐待，但這種情形，祇有政治經驗豐富的政黨，纔能選擇。至於論到國家的利益，民主政治的多數派，對於不同種族的少數派，從來不肯放鬆一步。仍舊保持過去專制時代的高壓手段，例如法國最窮的民主政治，對於阿爾卑斯的人民，從來不肯承認他們具有特殊性，而給予特種權利，而且君主時代允許該州人民可以在日耳曼語言文字和習慣，到了民主政治時代，這些權利，反遭剝奪。除了這個例子以外，我們更見到新近解放的民族，組成獨立國家以後，對於國內的少數民族，都不肯採取寬容政策，彷彿他們從前受了委屈，現在爲行使「報復」起見，亦必壓迫迫迫下的民族。巴爾幹的小國家，都有這樣的作風，依居住於這些國內的小民族，幾如危巢累卵，岌岌不可終日。德國統一完成以後，壓迫國內的波蘭人，意大利國力膨脹以後，對德國人和斯拉夫人，亦施行壓迫，這些都是歷史上的事實，無可諱言。

所以國家主義在初期的時期，原是維護自由主義，到了現代，已變成壓迫的工具了。

(二) 民族主義與同化政策

從各方面看去，一個國家對國內的小民族一旦征服之後，雖實行壓迫，並不是良好的處置方法。最好的莫若施行善政，使異族同化。我們知道各個民族在語言、文字、生活、宗教、和習慣上的差別，並非於形成之後，不能逐漸消除，所以一國之內，儘管有種種差別，若施行適當政策，總必歸於一致，甚至血統上的差別，亦可採用通婚方法，使各族互相混合，至於不能分辨。不過這種同化政策，以採用和平辦法，爲最適當。強迫同化的工作，雖不是毫無收效，但因傳播仇恨的因素，結果總是得不償失。過去專制君主，都設法使被征服的民族，歸國王化，甚至取消其宗教語言文字習慣，威利誘，變質齊下。凡是維護這種政策的人，自信同化政策，不是爲一方謀利益，乃是爲各方面謀利益，奧國人想使捷克人同化於日耳曼族，他們說，不獨奧國的政府獲得利益，就是捷克人的文化水準，亦可從此提高。匈牙利人自信爲馬齊亞族福利，對於其他民族，無不施行虐政，不過，他們同時亦深信這些虐待，既與匈牙利民族的利益相符合，則其他民族，亦應同意接受。

猶太族同化於他族的成效，最爲顯著。在歐洲方面，猶太人經過四五代的血統混合以後，幾能變爲寄生地的同血統，難以分別。他們很快喪失其種族的特性，與異族同化。尤其在德國方面，猶太族在文化生活上完全同化，他們將本族帶來的特性，與日耳曼族的特性，混合一起，協助純粹德國文化的發展。在大部份德國人的心目中，對於猶太人的文藝作家，無不同樣歌頌，這亦一個無可爭論的事實。因此，猶太人能參加德國各方面的活動，例如財政、金融、文化、教育、自由職業等部門的實權，都操在猶太人手中。顯而易見同化政策的原因，即在於此。在其他各國的猶太族，亦採用本族固有勢力，參加國內的活動，並取得領導地位。不過，各國對於猶太族，不採用德國所當的惡毒辦法，以資防衛，原來猶太族只有種族存在，並不獨有國土，沒有政權，即使同化於寄居地的民族，在該民族看去，絕對不是無

與同化政策，在歐洲和美洲的國家裏，比較容易收效，因為各個民族彼此所有同文化，已是互相接近，而水準亦復相等，大家自然容易融治，而且大衆的趨向，對於同化，亦都認爲有利無害。美洲合衆國，對於移來的民族，素持消於一爐的傳統政策，美國各民族的確有溶化而成美利堅民族的成效。這是因爲各國人民受了本國政府的虐待，遷到美洲，大家聯合起來，建成國家，把各人原有的國族思想，自願放棄，能夠互相團結。同時合衆國內部，不發生民族爭執，應歸功於聯邦制度，當美國立憲的時候，聯邦派得了勝利，就樹立中央集權制，將十三邦的大權力都集中於聯邦政府，其他各邦雖有邦政府及邦憲法，但聯邦憲法，爲各邦應行尊重的法律，無論邦憲或普通法律，只要和聯邦憲法相抵觸，就認爲違憲而不付實施。這民族自由聯合的優點，還有一點亦應注意，即遷到美國的民族，都是零零節節遷來的，並不是原住在美洲的土著，所以容易爲對抗土著而彼此團結。至於美洲土著，紅種與黑種人，曾經受過殘酷的待遇，逐漸消滅，白種人不獨不肯對紅種人推行同化政策，而且採用殘忍手段，防制紅種人同化。所以在美國國內，決不是從歐洲遷來的白種人，講民族主義，反抗美國，所以民族主義相號召而反對者，只有紅種或黑種。但因這些種族文化低落，人口亦逐漸減少，不復能爲害美國矣。

美國的同化政策，另有一種特點，就是以生理爲條件，祇要同化白種人不要同化有色種人。因此，對於紅黑種人的處置，既已嚴格，即對於黃種人亦採排擠方式。例如美洲的移民法，限制中日兩國之勞工，引起美日的仇視，（譯者按美國排擠有色種人的傾向，自這次大戰以來逐漸改變，現在對於我國僑民，尤其對於華工，頗能優待，這同化政策易方向的表示，當然不是我們所歡迎。限制勞工的原因，無非爲減少國內勞動階級的鬥爭，因此我們看到國家主義在經濟方面對於同化政策，有二種相反的態度：一方面，資本家願意外國勞工前來工作，因爲既易於控制，又不爭待遇，遠較本國勞工爲優；但另一方面，勞動階級都反對外國移民，恐怕掠奪他們的工作，而同

階級的人，自相殘害的鬥爭，就隨着同化政策的方向，日趨激烈。排外的民族主義，更因階級的對峙與階級利益的受威脅，變成了變態的仇外運動，勞動階級的情形，已如上述，其他工商業對於同化政策的態度，亦復相同，德國社會主義的反猶運動，以及種種的排外政策，無非是這種心理的反映。如果現代的猶太人肯做法其祖先，甘心屈居隔閡，不和德國人在工商業上，從事劇烈的競爭，則德國或肯寬容他們。但事實上，德國的工商業，乃至自由職業，都握在猶太人手中，因爲猶太人天資聰明，經濟力亦復本來雄厚的，在不平等的自由競爭之下，遠非德國人所能幾及。這是德國人對猶太族所有的戒懼，所以國社黨不惜運用殘酷的手段，摧殘猶太族現有的勢力，並驅逐他們出境，不許本國人和猶太族通婚，以防止其死灰復燃。這種政策，如果公開地宣布出來，乃是保護國內工商業的一種處置，同時亦是各國對外政策的一項，不足爲奇。

我們引爲驚奇者，德國國社黨採用慘無人道的辦法，對付猶太族，乃以優秀民族的理論，激動德國民族的自傲心，並利用羣衆的自傲心理，造成全國一致的排外運動，這種處置，適足證明二事：（一）同化作用，實際上早已得到宏大成績，因爲猶太族雖在種種限制之下，同化於當地民族，已證明爲可能之事，而且同化之後，民族素質，更可改良。（二）優秀民族的理論，根本被事實反證，因爲國社黨長假猶太族的競爭，妒忌猶太族的成功，所以借用暴力，以作斬草除根之計，是不是正足證明猶太族的能力，遠非德國人所能比擬嗎？假使德國人真是優秀民族，則在一切的鬥爭上，應該都得勝利，何必採用野蠻手段呢？譬如醫生和律師，原來完全憑自己本領，博人信任，若因外種和律師得本國人的信任，無法與之競爭，必須下逐客令以保護本國優秀。和律師，則只是一種排外政策，並不足以表示本國人的優秀。

（二）族主義與生物學

國家，現階段，已完全變更其原有性質。自從以生物學爲基礎以來，還要狂熱的國家主義者，深信人類因形體不同，生理不同之故，種種族在生物學的立場上，絕無同化的可能性。髮膚的顏色不同，目形與腦人的觀念

不同，頭腦的大小圓長不同，是即各種族間的差別，他們在體質三方面，

根本互異，永遠不能相同。因此，各民族對於善惡的分辨，亦非單靠教育和

刑罰理論訓練等所能使之趨於一致。查人類對於善惡的認識，與其真純上的

異性，成正比例。根性的優劣，完全受之遺傳，有好的根性，應以適當的方

法，加以發揚光大，這切當的辦法，應於消極方面，即應設法剷除一切由傳

染得來的劣根性，並保存血統的純潔。所以提倡優劣收的劣根性，深信

優等民族，是永久的優秀，可以克膺空際和時間上的一切尊嚴，其抵抗環境

的力量，從生和鬥爭的過程中，得到愈鬥愈強的本能。他們既從鬥爭中取得

最後勝利，應享受特種權利，在國內如斯，在國際亦當如此。

故自採用生物學為民族主義的基礎以來，這這新民族主義的信徒，對於

過去採用同化政策，使國內外的異族，與己族發生融化的作用的老法子，大不

謂然。他們說，同化政策，無論出於自願，或出於強迫，均等於惹做惡孽，

比皆是，倘若令國內的異族，各成一單位，不相混合。因為明顯的敵人，易

於防範，而發生形式的毒素，則難以排除。遺憾，實感民族融運必要的

處置。

成其所願，而日

向外擴張

以事變的

種政策，並

種生命財產，亦

種生命財產，亦

種生命財產，亦

種生命財產，亦

種生命財產，亦

川論曹操之內政

徐德麟

上期本刊，作者曾為文論曹操之用兵，並其政略之運用，本文再就曹操對內政方面之三大措施，加以介紹，所謂三大措施者，一為屯田，二為移民，三為擢用賢良守相。茲依次介紹如下：

自桓靈之間，以迄建安初年，年流饑饉，人民餓死者甚衆。後漢書桓帝紀載：建和元年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餓死；元嘉元年四月，京師旱，任城饑，民相食；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饑，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延熹九年三月，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鬻尸者。後漢書靈帝紀載：建寧三年正月，河內人鬻食，失，河南人夫食，熹宗六年四月，大旱，七州饑。後漢書獻帝紀載：興平元年六月，大旱，秋七月，三輔大旱，穀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白骨委積；建安二年五月，饑，是歲饑，江淮間民相食。魏志武帝本紀載：興元二年一斛，五十餘萬石，人相食。其時人民飢死者甚衆，而糧食缺乏，為最。

此之問題，牽涉甚廣。其亦必缺乏。魏志武帝本紀載：興平二年與呂濞（關西二十里）之爭。自餘日，蝗虫起，百姓大饑，布糧食亦盡。其時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

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棗，袁術在江淮，取給浦風，民人相食，州里饑饉。又陶謙傳載：「初平四年，太祖社讎，攻徐州餘城，至彭城（今徐州），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之北流，謙退守郿，太祖以糧少引軍還」。魏志先主本紀裴註亦引裴雄記云：「德在廣陵，飢饉困敗，吏士大小自相殘食，窮饑極逼」。由此數事，可知軍糧缺乏，實為當時兵家所最感。雖者，而其進退成敗，大抵均與糧食之有無相關。

至曹操解決當時糧食問題之方法，則為除行軍時，爭先奪取其地穀粟以外（註一），其根本之政策，為勸行屯田。屯田之議，始於東漢獻帝而始實行於建安元年（註二）（曹書武帝本紀亦曾謂馬超曾向曹操建議且請日守之策，其建議之略，當較高祖勸諸葛為晚）。魏志武帝本紀裴註引魏書，謂自建安元年即「募民屯田許昌，得數百萬斛，於許州郡別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糧之勞，發錢減軍賦，克平天下」。魏志任峻傳亦云：「太祖每征伐，常留軍守以給軍，是時歲飢，軍食不足，羽林監額川麻氏建議屯田，太祖以較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聚，倉庫皆滿……軍國之儲

起於春而成於秋」。蓋曹操在起兵之初，深感食糧不足之苦，至建安五年官渡之戰，仍以糧少為憂，自後，除建安十二年征烏桓，建安二十年征張魯，以道遠糧運不便而外，屢有征伐，均得軍糧轉輸不置者，皆由於屯田政策之成功。加以曹操屢開河渠，以便運輸，於是舟車相接（註三）大減運輸勞費之苦。此於曹操行軍上有極大之便利，亦為其戰爭勝利之一重要因素。

且屯田不僅可以充裕軍糧，其於安定社會秩序，維持人民生活，亦為功最大。蓋其制度，未可詳考。約而言之，似可分為募民屯田與募民屯田二類。大抵最初為募民屯田，魏志武帝本紀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食祿傳載：「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浦」。國淵傳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募事，淵獲損益，相士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庫豐實」。是皆募民屯田之證。以募士屯田，似在黃初以後。魏志胡華傳載：「置東屯，且佃且守」。魏志艾傳載文而何瑪建議策，「今淮北屯三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佃且守」。皆募民屯田之事實。故曹操時之屯田政策，係以募民耕種為主，而於安聯流

亡，縱定社會秩序，民生生活，實有深切之關係。

若言曹操之移民

同有二大目的，一為充實重要部邑，二為與敵滄民力。魏志司馬朗傳載：「先時民有徙充都」。魏志杜襲傳載：「後襲領丞相長史，臨太中，討張魯，太還拜襲領丞相長史，留督漢中軍事，緩急兩導，百越自蜀出徙洛陽者八萬餘口」。梁習傳載：「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郡雖歸屬，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推棄，作為寇害，更相煽動，往往甚焉。習到官，諭曉招納，皆隨召其妻右，稍稍著服，使詣幕府；臺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分給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鄠，凡數萬口」。鍾繇傳載：「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上述數事，皆為令民移實部邑之舉。至於以郡縣及洛陽為移民之目的地者，則因自董卓之亂，徙民長安以後（註四），洛陽即成空城，其附近二百里以內，亦無耕種，無有子道；而其地勢重要，故移民其地，使徙者息，俾資鎮守。鄠城則本為袁紹之根據地，自袁氏失敗以後，曹操常居鄠城，在事實上，即等於當時之首都；且自秦漢以來，鄠下為沃野之區，便於耕種（註五）。故徙民其地，以為強本弱幹之謀。至徙往其他部邑者，亦多為亂後人口過少，特為移往充實之故。

若在戰爭之時，其移民力之強弱，則更不遑論。魏志蔣濟傳載：「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徙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能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家皆驚走」。張遼傳載：「遼遣與梁進拔險安（故城在今河北清豐縣北二十里），徙其民河南」。張郃傳載：「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二郡，徙其民於漢中」。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魏志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張既傳載：「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令既之武都，徙民五萬餘家，出居扶風天水界」。楊阜傳載：「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便信索著，前後徙民區，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萬餘戶」。以上諸例，是為在作戰時強迫移民之事實。

又移民充實部邑，其移居以後，在部邑附近，必以農業為其最重要之生產事業。魏志鄭渾傳載：「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於徙者與單騎者相伍，由信民與孤老為比，勸稼明禁令，以發農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以京兆尹而移民者，是知移實部邑云者，必在部邑附近，以耕種為生。若因爭地而移民，則必更以農業地區為其移動之方向。漢中為漢水上游之盆地，三輔（京兆郡扶風）及天水在渭水流域，皆為農業地，故當時移民動向，係由巴西移漢中，由漢中移渭河流域。此外或有專以屯墾為目的之移民，如魏志者，僅有鄭渾傳所載：「遣民田漢中」之語；而唐鑑所載：「帝以魏晉婦，故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盡土地墾殖，百姓困，穡感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係實初年之事實；在建安中無再細之記載可考耳。

至於曹操之擇用賢良守相，則更為其事業成功之重要因素。魏志何夔傳載引魏書云：「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郡令，羣為城安守之標準，係以名士而有鎮撫地方之才者為先，而尤以變亂最多之地，或甫經攻取之地，於其地方官吏之選擇，最為注重。其在平定呂布以後，即以臧霸為瑯琊相，並以其友吳敦為利城太守，故青州徐州諸地，雖在極擾之中，而霸等征暴安良，經理其地，功為最大（註六）；至官渡之戰時，霸以兵入青州，亦在軍事上有牽制袁紹之功，此其得力於賢良守相之例一也。其當北攻袁紹之際，孫策方強，梅乾曾請陳蘭等，又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破，無以為守禦之策；於是劉繇為揚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觀受命之後，單馬適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築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巧波及菰波七門吳縣諸場以澆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多積木石，編作草蓆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註七）。其後合肥雖為重鎮，吳兵屢次北出，皆不得越合肥一步，此其得力於賢守相之例二也。又在破滅袁氏之後，并州初定，胡狄在界，張雄跋風，更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推棄，作為寇害，更相煽動，往往甚焉，於是梁習為并州刺史，習到官，諭曉收納，皆隨召其妻右，稍稍著服，使隨

